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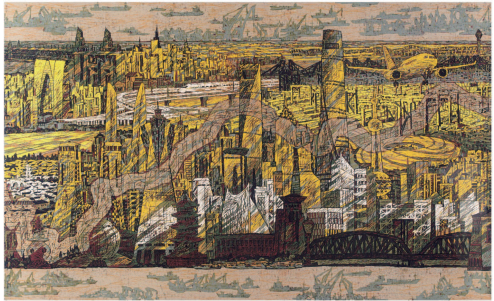
十三岁那一年，我家正对面的石库门墙上，忽然多了一块石碑，上面刻着“《新青年》编辑部旧址”。我上学放学，出门进门，只要一抬头，就看得见。

我的少年时代，就是在这条弄堂里度过的。记得主弄很宽很大，我和邻居的孩子们常在这里玩刮片、拍烟纸；右拐第一条支弄同样很宽很大，我和邻居的孩子们常在这里打弹子、捉蚂蚁。我家正对面，是一幢很宽很大的石库门，冷灰色的石条

框架，剥蚀了的木门黑漆，锃光亮的黄铜圆环。记得当时，里面住了好几户人家，男女老少，甚是热闹。那时我最爱看到的，是一个长我几岁、名叫阿萍的白净姑娘。石库门是上海最普通、也是最普遍的民居，在这座城市里，不晓得有几千万幢。

后来读了书，知了史，才知道《新青年》杂志就是1915年9月在这里创刊的。《新青年》宣扬民主科学，倡导新的文学，号召青年反对封建专制，追求独立自由。这幢石库门，便是《新青年》创始人陈独秀的编辑部兼寓所。当年，胡适、鲁迅、刘半农、钱玄同等大学者、大作家不但是此处的常客，更是杂志的主要编撰者，大量振聋发聩的论文、杂文，众多发人深省的小说、诗歌，都是从这里传播出去的，受此影响的人，不晓得有几千万个。

后来宣了誓，入了党，才知道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就是1920年8月在这里成立的。这与《新青年》的思想启蒙和政治引领，有必然的关系——《新青年》正是从此开始，成了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内刊《共



潮起大江 (版画) 金祥龙

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我的名字就是“国庆”，总有人让我讲讲名字背后的故事。它是父辈那一代人，怀着对国家和民族的最赤诚的情感而给我起的。我是60后，我的父辈们经历了旧中国，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他们深知这一路不是一帆风顺的，有过喜悦，也吃过苦头，但他们始终对祖国怀着很深的情感，对国家和民族充满了希望，希望自己的儿孙永远爱这个国家。我一直觉得叫国庆的人，都是对这个国家怀着最美好情感的人，而且运气最好，并因为有了这个名字更知道努力拼搏，奋发向上。

小时候我总跟着父母去天安门，每当看到“欢度国庆”四个大字就特兴奋，不断地问爸妈：“天安门怎么知道我过生日呀？怎么到处都写着欢度国庆？”那时不懂事，就觉得好像全中国都在给我过生日，一种非常单纯的自豪感。等到后来上了中央戏剧学院，进入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再到上世纪90年代初加入解放军总政歌舞团，回望走过的几十年演艺岁月，我深感幸运：到今天依旧能活跃在一线，就是这个名字给自己带来的福气，

命运、何为历史和人民的选择之前，它们至多不过是我童年的回忆；而当我真诚地信服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真理之后，它们才真正成了我信仰的圣地。在石库门前，遥想大中华的困厄苦难，追念思想者的开创启蒙，景仰共产党的伟大前贤，我固然为与他们在时间上的相隔而略感遗憾，却更为与他们在空间上的接近而倍觉慰藉——从工人罢工武装暴动，到农民运动土地改革，再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从上海到广州、南昌、汉口，到井冈山、古田、遵义、瓦窑堡，再到延安、西柏坡和北京……从开天辟地，到战天斗地，再到改天换地，党从这里起步奋进、壮大发展，用了二十八年，终于从石库门走到了天安门。在石库门前，我忽想起“山不在高，有仙则名”这句话来，再衬觉得不妥，因为上海滩没有山，哪怕是不高的山丘；共产党也不是仙，更从来不信有什么神仙。我又想起“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悬圃”这句诗来，略思更感不对，因为石库门只是百姓的栖身地，这里绝没有高耸的庙堂和高贵的来历；而共产党作为人民的带头人，绝不会率领大众去追求那飘渺的天国，寄望那来生才有的虚幻的幸福。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及其所从事的伟业，确是前无古人的壮举。

党的十九大召开不久，我再一次来到树德里，重温党史、再宣誓。出了一大会址，记忆驱使我的脚步，来到渔阳里。我已是五十一岁了，当初宽大的弄堂，竟变得如此狭小和简陋；而我家正对门墙上的石碑，依然如此。不仅如此，更变得这般鲜明和深刻。

最鲜明和更深刻的，是我明白，若不是读了书、知了史，若不是宣了誓、入了党，渔阳里和树德里即使离我再近，也是很远。若问何故，便是在我不懂得何为国家前途、何为民族

命运、何为历史和人民的选择之前，它们至多不过是我童年的回忆；而当我真诚地信服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真理之后，它们才真正成了我信仰的圣地。在石库门前，遥想大中华的困厄苦难，追念思想者的开创启蒙，景仰共产党的伟大前贤，我固然为与他们在时间上的相隔而略感遗憾，却更为与他们在空间上的接近而倍觉慰藉——从工人罢工武装暴动，到农民运动土地改革，再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从上海到广州、南昌、汉口，到井冈山、古田、遵义、瓦窑堡，再到延安、西柏坡和北京……从开天辟地，到战天斗地，再到改天换地，党从这里起步奋进、壮大发展，用了二十八年，终于从石库门走到了天安门。在石库门前，我忽想起“山不在高，有仙则名”这句话来，再衬觉得不妥，因为上海滩没有山，哪怕是不高的山丘；共产党也不是仙，更从来不信有什么神仙。我又想起“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悬圃”这句诗来，略思更感不对，因为石库门只是百姓的栖身地，这里绝没有高耸的庙堂和高贵的来历；而共产党作为人民的带头人，绝不会率领大众去追求那飘渺的天国，寄望那来生才有的虚幻的幸福。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及其所从事的伟业，确是前无古人的壮举。

有人统计，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革命遗迹多达四百多处，几乎都是在寻常街巷之间，都是在普通民众之中。这就有力地昭示了中国共产党就是那样生于人民、出于人民、带领人民的，就是这样始终与人民风雨同舟、同甘共苦、生死与共的，就是这样赢得了民族自由、国家

中国晨吟

褚水敏
七十韶光总动襟，风华满国望当今。
山河明目新霞闪，人物生辉瑞气临。
铭记初心回味久，远谋长路静思深。
欣观晓日增鲜丽，正照彤彤赤子心。

中国心

姚国仪
回眸七十载，曙色正初临。道路光先引，江山谁敢侵。
红旗耀红日，强者发强音。我本炎黄裔，原装中国心。

因为这个名字是跟国家紧紧相连的。改革开放四十年让我们这一代人赶上了，我的内心始终对国家的发展和强大心怀感恩。

少年时代，对我影响深远的有两首歌。一是《我爱北京天安门》，再大一点最喜欢唱的就是《北京颂歌》，觉得作为北京人特别骄傲。

我爱你，中国

蔡国庆
就个人而言，对我人生改变最大的歌曲是最早成名的那首《北京的桥》，它让我在中国流行乐坛有了自己的位置，也让国内流行歌坛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声音，否则永远都是在模仿。这么多年来，中国敞开国门后把文化艺术推向海外，同时也把国际舞台的文化艺术迎进来，这个变化非常了不得。这些年国际文化的碰撞、交融势不可挡，中国流行乐坛已经变得无所不有了。从唱法、曲风到配乐、宣传媒介，拓宽改变实在太多，唱片卖不动，成了收藏品，只用一部手机就可以听音乐了。



富强、人民幸福的。于是，我才真正领会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的真义，才真正领会了毛泽东所说“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邓小平所说“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作为每一个党员的最高准绳”；习近平所说“人民是历史进步的真正动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的真谛。

在我家正对面的石库门前搜索记忆，追寻往昔。这里依然是民居，有许多户人家，男女老少，甚是热闹。此刻最让我欢喜的，是一群鸽子飞过石库门的上空，向东飞去。在这里，鸽子再也寻常不过，却代表着和平与幸福，理想与信念。

我找回了我的童年。我更坚定了我的初心、牢记了我的使命。红墙青瓦梧桐树，更经了、风复雨。开启百年修远路。灯火初上，雄图方展，举国风云舞。重回原点思如缕，石库门前挥难去。破雪冲霜再几度。有初心在，领人民向，中国梦圆处。（调寄《青玉案》）

书桌前，摆放着几位名人日记。这些日记的作者，分别为原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先生、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办人黄炎培先生、浙江大学原校长竺可桢先生和《文汇报》原社长兼总编辑徐铸成先生。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我忽发奇想，查阅他们于1949年10月1日的日记，试图挖掘当年更多的历史细节。

1949年，张元济82岁、黄炎培71岁、竺可桢59岁、徐铸成42岁。作为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他们都受邀参加了开国大典，并在日记里写下了真实记录。不过，因各人年龄、经历和职业不同，所记日记也各有侧重。例如，开国大典那天的北京天气，《黄炎培日记》里写：“阴，68°（约20摄氏度）”。《竺可桢日记》则写为“晨阴66°，下午阴72°（分别约19摄氏度和22摄氏度）”，这体现了竺可桢这位气象学、地理学大师的严谨和仔细。而在《张元济日记》里，又写得非常感性：“晨微雨，午饭后渐晴霁。”张元济本人喜欢早睡早起，也许，那天清晨北京确实飘过零星小雨。

10月1日，是新任中央政府委员的黄炎培最忙碌的一天。据《黄炎培日记》记载，上午十时，他在欧美同学会参加报告会；十一时，到北京车站欢迎著名作家法捷耶夫率领的苏联代表团；下午二时，出席中央人民政府第一次会议；三时，在天安门城楼观礼、阅兵，直到“入夜，灯炬，五色火焰升霄”；晚上八时，“欢宴苏联代表团……”与黄炎培相比，其他几位先生似没有这么劳顿。徐铸成是下午二时“与代表们乘车鱼贯赴会场”的；竺可桢“午后二点半乘车经午门至天安门门楼上”；张元济准时抵达，“在天安门楼上行政府成立礼”，因为年事已高，他并没有参加晚上的庆祝活动，“与胡子昂同车归寓，时方六时”，“八时半即睡。闻外间游行欢呼声至夜半方止。”

对于天安门广场盛况，张元济记得很简洁：“拾阶而上，见游行队伍列坐广场，蜂屯蚁聚。”竺可桢描述了广场全景：“天

父亲前年去世时，没有留给我们小辈什么贵重的东西，却留下了一件被他视为最珍贵的宝贝，即便是“文革”期间家里受到冲击时，他都千方百计将它藏起来，没有被“抄”走，那就是当年他大学毕业时的纪念刊。

这本册子的特殊意义在于，它是一名大学生记载了跨越1949年新中国成立重要经历的毕业纪念刊。纪念刊里，有新中国第一任大法官、时任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志让从北京写给毕业生的贺信及陈望道先生写给全体毕业生的一

这些天，我在上海东方卫视参加《达人秀》，看到很多优秀的中华儿女。其中有19岁的海外华人少女带着父辈的希望，回到祖国的舞台上唱响《山歌好比春江水》，中国的优秀文化让世界上所有的华人都感到自豪；也有80多岁的退休教师利用业余时间，坚持了61年的歌唱，61年经过风风雨雨，就像所有中国人一样，为了心中的梦想执著到底……

在一些年轻网友眼里我可能已经过气了，可是我这口气可长了，一时半会儿真过不了气，你看，这么多有意思的节目等着我去做。因为最当红时，我知道怎么与人相处，到了事业平淡期时，就会有很多人反过来帮你，让你的艺术生命能够延续。尽管在娱乐圈里说真话和实话可能容易得罪人，但我认为一定要真诚待人。我之所以敢讲实话、敢讲真话，因为我有底气，那就是我爱中国，无论今后她将面对怎样的风雨，她一定会走向更强劲的未来。我爱她。

明请读《生命中的幸运儿》。

安门前之广场新辟成，可容十七万人。如排得紧可卅万人。今日余等到，学生、公务员、军队已立待数小时，会场之庄严为余所未曾见。”黄炎培的记录则带有浓厚的感情色彩：“红旗、红额、红灯，一片红色。燕都自辽金元明清以来，殆未有之盛典。”难怪到次日清晨，他还兴奋不已，在枕上吟咏《天安门歌》九首，其中第一首为：“归队五星旗下，齐声义勇军歌。新的国名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记者出身的徐铸成，日记最为生动：“天安门广场挤满人群，红旗似海，殆为我我国历史上空前之盛况也……三时，大会开始，毛主席等就位，鸣礼炮一百二十响，毛主席亲自升旗，用电动。闻此装置，由技术人员连夜装好者。旋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并大声高呼‘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全场一片欢腾，余亦感热泪下。”

那一天，竺可桢和徐铸成还在日记里分别写了会友感悟。竺可桢写道，原北京大学校长、72岁的何燏时先生也应邀前来观礼，“现住北京饭店，今日乃徒步而来，可称健步矣……何自来自即醉心于共产主义，在浙江为先进，渠自辞北京大学校长后即未任事。”徐铸成则记下了与郭春涛先生“并倚城楼”的对话。郭春涛原为冯玉祥先生部下，也是一位民主人士。谈及蒋介石的倒行逆施，两人感慨万千，“拼命抓权，排除异己，最后两手空空，成为孤家寡人，殆即所谓历史的辩证法欤？”在城楼上，徐铸成还幸遇辛亥老人李书城先生，李书城曾帮助中共建党，“一大”就是在他家中召开的，“他神采奕奕，不似六十八岁老人。”当天日记中，张元济、黄炎培均未留下与人晤谈的记录，但张元济在日记的最后一段写道：“与毛泽东信，赠与《林文忠政书》一部。令人有老友如晤的感觉。”

日记，是当事者记录某一日生活、工作的最原始的史料。品读上述日记中开国大典那一页，可以真切触摸到当年爱国知识分子向往光明、憧憬未来的心跳。他的愿望被一拖再拖。母亲去世后，父亲自己却也行动不便了，我虽然几次尝试着推轮椅送父亲出门，都没有成功，直到父亲去世，他都未能如愿，这成了他一生的遗憾，也成了我们小辈最大的遗憾。

今年夏天，学生放暑假，复旦校园人不多，我便带着父亲的纪念刊去代他完成未竟的遗愿。父亲毕业时邯郸路上的复旦大学校门已不复存在了，但走进校园，以老校长李登辉命名的登辉堂（现名相辉堂）依然还在，父亲生前告诉我，当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时，他和同学们

一本毕业纪念刊

龙钢

封信《欢送毕业同学》和周谷城先生写给诸位毕业同学的赠言。所以，父亲生前特别看重这本纪念刊，不管到哪个岗位，甚至是受到冲击的特殊时期，他依然小心翼翼地保护着这本纪念刊，直到病重已经很难说话时，仍念念不忘要我好好珍藏。

父亲1951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文学院院长工商管理系。当时，新中国刚成立，国家百废待兴，急需一大批高校毕业生，投入到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去。父亲就是在这

一刻走出校园，踏上工作岗位。那时复旦大学生工商管理系毕业的学生非常“吃香”。因为那时企业管理层里真正学过企业管理的人简直是“凤毛麟角”，经过双向选择，父亲到中国粮油进出口总公司上海分公司工作，成为该企业成立后第一位复旦工商管理系科班出身的管理人员。

由于各种原因，父亲离开校园后，六十多年一直没回过复旦大学。晚年他的最大愿望，就是再回一次复旦校园，看看学校的变化，寻找当年他就读时教学楼、运动场。然而，由于父亲晚年身体健康时，要照顾患病的母亲，

他的愿望被一拖再拖。母亲去世后，父亲自己却也行动不便了，我虽然几次尝试着推轮椅送父亲出门，都没有成功，直到父亲去世，他都未能如愿，这成了他一生的遗憾，也成了我们小辈最大的遗憾。

今年夏天，学生放暑假，复旦校园人不多，我便带着父亲的纪念刊去代他完成未竟的遗愿。父亲毕业时邯郸路上的复旦大学校门已不复存在了，但走进校园，以老校长李登辉命名的登辉堂（现名相辉堂）依然还在，父亲生前告诉我，当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时，他和同学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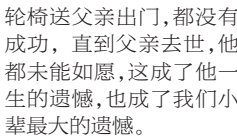
还在登辉堂里聚会庆祝，有的同学还激情上台演讲，随后，大家走出校园，举着红旗向上海市中心方向游行，庆祝新中国的成立。当年的校钟和复旦校园里的小桥流水及当时的体育馆、寒冰馆、工人俱乐部原址也没有找到踪影。是啊，70年了，复旦校园也有了新面貌。

一本毕业纪念刊，承载了父亲当年求学时的许多回忆，也见证了新中国教育事业在党的领导下翻天覆地的变化。

父亲生前告诉我，当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时，他和同学们

夜光杯

责编：史佳林



父亲生前告诉我，当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时，他和同学们

还在登辉堂里聚会庆祝，有的同学还激情上台演讲，随后，大家走出校园，举着红旗向上海市中心方向游行，庆祝新中国的成立。当年的校钟和复旦校园里的小桥流水及当时的体育馆、寒冰馆、工人俱乐部原址也没有找到踪影。是啊，70年了，复旦校园也有了新面貌。

一本毕业纪念刊，承载了父亲当年求学时的许多回忆，也见证了新中国教育事业在党的领导下翻天覆地的变化。

